

給知識分子的碑與歌

關於紀錄片《紅日風暴》

觀看《紅日風暴》，能聽到胡風臨終前六個月的聲音，那完全是一種萬事皆休的味道。這部紀錄片反映了中國一代文學精英神俱毀的整個過程。



影片的海報頗有意味，紅日之下胡風和毛澤東面面相向但並不相接。

(作者提供)

在胡風事件過去半個多世紀後，終於有人用紀錄片這樣的視聽媒介來對其系統地調查、梳理、還原、呈現，以及紀念與哀悼，這件事令人欣慰。因為牽涉其中的許多人要麼已經過世，要麼正在靠近死亡，再進一步真不知會有多少損失和遺憾。《紅日風暴》的導演是兩位女性，其一是上海導演彭小蓮，其父彭柏山（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以「胡風分子」之名受難致死，這驅使她用一生的時間去面對，於是她的個人經驗構成了貫穿影片的中心線索，影片也成了她的杜鵑啼血之作；另一位是成長於文革後的年輕學者衛時煜（片

中用筆名閩燕墨雨），她雖遠離事件中心，但對胡風事件抱有一種知識分子式的探求究竟的渴望。彭小蓮和衛時煜的合作，是熱情與理性的結合。二〇〇三至二〇〇六年間，她們一共深入採訪了二十六位胡風分子和十幾位已經辭世的胡風分子的親友，並積累了兩千多張資料照片。之後她們進入整理素材和梳理思路的階段，而對其他一切相關的歷史素材的收集，諸如新聞片、手稿、書籍、雜誌、繪畫和政治漫畫等，則從來沒有停止，因為每一件資料都可能使她們離真相更近一步。她們的理想，是要做一種「既沒有被官方清洗，又能反映歷史事

衛禹蘭



一九四九年在懷仁堂前，前排左起：趙樹理、馬思聰、蔡楚生、柯仲平；後排左起：程硯秋、史東山、田漢、艾青、周揚、丁玲、胡風、巴金。

(作者提供)

件中個人經歷的片子」。從結果來看，《紅日風暴》幾乎挑戰了兩個極限，一是兩個多小時的紀錄片所能容納的歷史信息量的極限，二是它極盡所能的表現方式，音樂、配音、聲效、動畫演繹等手段都被最大程度地調動起來去啟動那些沉寂的史料，往事猶如被釋放出的困獸，帶着灼人的氣息迎面襲來。不難想像這樣一部作品

對普通觀眾的衝擊力：你會震驚，然後百感交集，一面面對那段歷史本身。

追溯受難歷程

《紅日風暴》的內在結構接近於新聞調查的思路。

敘事從胡風（一九〇二—一九八五）被捕的一九五五年那個暴風雨之夜開始，國家暴力機器不由分說地闖入個人生活，官方資料顯示：九十二人被正式逮捕（另有沒記錄在案的逮捕），六十三人隔離監禁，七十三人停職審查，二千一百多人深受牽連，他們的命運在猝不及防中急轉直下。影片接着向它的前史追溯，從一九三三年胡風自日本歸國開始，胡風與魯迅精神的內在關係，左聯內部的分歧與矛盾，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策略和他的文藝政策等被一層一層揭示出來。接着是一九四九年之後種種關係如何微妙演進，權力如何無情與弄人，而其中一個個具體的人又呈現出

怎樣的面目與嘴臉。再接着是一九五六一至一九七六年間風暴中的受難歷程，胡風分子的命運如同石頭擊出的水紋，它的深度和寬度畢現眼前。最後是一九七六年「日落」之後，那些受難的人的餘生和餘聲。八十年代為胡風冤案的平反，竟歷經三次（一九八〇、一九八六、一九八八）才最終徹底平反。而平反又能怎樣？他們已經是生命被消耗殆盡的老人，在社會的邊緣獨自承擔貧病和困頓。

在極權社會裏直道而行

影片的海報頗有意味，

紅日之下胡風和毛澤東面面相向但並不相接。一個是有領袖氣質的文學家，一個是不容置喙的當權者，這種對峙的黑色幽默之處在於，儘管文學從未想過要否定權力，但是權力從根本上否定了文學；天真的胡風對此視而不見，固守他對文學獨立性的理解，在一個獨裁社會

